“星球史”视野下的文明思考*

张旭鹏

汤因比在1947年发表的《文明经受考验》一文中，曾感慨于西方人所获得的开阔的历史眼界：“就空间而言，我们西方的眼界已经扩展至这个星球上可居住和可进入之表面上的所有人类，以及这个星球在其中不过是极小微尘的恒星宇宙；就时间而言，我们西方的眼界已经扩展至晚近这6000年中升起又衰落的所有文明，以及60万到100万年之前人类起源的史前历史，乃至大约8亿年前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历史。我们的历史眼界得到了何等惊人的扩展！”①

汤因比显然不会意识到，他对历史时间和历史空间的判断，与当前方兴未艾的“大历史”（big history）十分相似。大历史在时间上可以追溯至大爆炸，在空间上则可以涵盖整个宇宙。从研究实践来看，大历史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分别对应宇宙的历史、地球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② 相比于宏观和微观层面，大历史的实践者更喜欢从中观也就是地球的历史入手，以便有效地将宇宙、地球和人类的历史统合起来。不过，大历史视角下的地球历史有着自己的独立性和严整性，它不是人类历史的背景，更不是人类历史的延续。相反，地球具有自己的“深度历史”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招标项目“西方历史理论发展史”（项目批准号22VLS016）阶段性成果。

① ［英］汤因比：《文明经受考验》，王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4页。

② 国际大历史学会官方网站上有一句醒目的话，指明了大历史的研究范围和主旨：“大历史尝试运用现有的最佳经验证据和学术方法来理解宇宙、地球、生命和人类的整体历史。”这里的生命的历史基本可以视为地球历史的一部分。参见 https：//bighistory. org/whatisbighistory，2023年3月24日访问。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deep history*),[①] 它所呈现的不是人类居于其间的全球（global）的历史，而是作为宇宙之一部分的星球（planetary）的历史。

汤因比之所以发出上述感慨，是为了说明即使人类具有如此开阔的历史眼界，但看待历史的眼光却非常狭隘，依然局限在民族国家之内。而从民族国家中所诞生的阶级和战争这两类事物——前者造成了社会的分裂，后者有可能毁灭整个人类，却使人类文明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②] 汤因比将文明的危机归结于阶级和战争，虽然不见得完全正确，但他关于文明危机总是产生于国家或国家间事务的论断，在当时以及之后，却是人们思考此类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比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③]

当前，文明的冲突及其所导致的整个人类文明危机的风险依然存在，但是借助于冲突的双方，也就是文明的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和协商，还是有可能在最大限度上规避这一风险。反倒是环境、生态和气候的恶化加之于各个国家甚至整个地球的风险，却有可能给人类带来更加严重的文明危机。因为较之于社会内部的纷争和国家间的战争，环境、生态和气候方面的因素，尤其是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更大，它们所造成的后果往往是不可逆，甚至是难以修复的，更非人力所能改变。不仅如此，环境恶化、全球变暖等现象也会打破有限的资源在国家间分配的平衡，让本来就不平等的国际秩序更加不平等，甚至引发地缘争端，使得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加大，进而加剧传统意义上的文明危机。

因此，当前对文明危机的认识应当从超越国家的"星球史"（planetary history）的高度加以考量。对于什么是星球史，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较早有过论述。在 1987 年的论文《脆弱的地球：走向一种星球的

---

① Martin J. S. Rudwick, *Earth's Deep History: How It Was Discovered and Why It Matter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Jan Zalasiewicz, *The Planet in a Pebble: A Journey into Earth's Deep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② ［英］汤因比：《文明经受考验》，第 19、20 页。

③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 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历史》中，沃斯特指出，星球史是与国家史相对应的。历史学家在书写国家历史的同时，也应书写地球的历史，因为人们在自己的祖国家园之外，还拥有一个共同的地球家园。与国家史不同，星球史这部更大的历史，展现的是人与自然世界之间不断演变的关系。用沃斯特的话说，“星球史在本质上一直都是环境史”。① 在沃斯特的构想中，星球史标示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它凸显了自然乃至地球的重要性，以及将自然和地球作为历史研究主体的重要意义。沃斯特希望借助星球史的概念，批判人类对权力和理性的盲信及滥用，强调人与自然环境高度依存的关系。

尽管沃斯特强调了环境、自然甚至地球的重要性，但他所设想的星球史依然是在人类历史的框架中展开的。近年来，迪佩什·查克拉巴蒂重拾了星球史这一概念，但较之沃斯特，他更重视地球作为一个独立系统的意义，也就是说，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自然环境，乃至地球内部的深层结构，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有机的整体在历经数十亿年的历史演进后，发展成为宇宙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查克拉巴蒂不主张使用全球（globe）、世界（world）或地球（earth）这些以人类为中心或者更侧重人类的概念：“然而，它既不是全球，也不是世界，更绝对不是地球。它属于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这颗星球（planet）自我呈现为天文学和地质学研究的对象，呈现为包含生命历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所有这些维度都大大超出了人类的空间和时间现实。”②

为了更好地解释地球的“星球”属性，查克拉巴蒂特意比较了“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与“可居住性”（habitability）这两个概念。③“可持续性”将对人类的考量放在首位，是一个以人类为中心（anthropocentric）的概念。我们可以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为可持续性发展所下的定义中看到这一特点：“可持续性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概念：‘需要’的概念，

① Donald Worster, “The Vulnerable Earth: Toward A Planetary History,” *Environmental Review*, Vol. 11, No. 2, Summer, 1987, p. 90.

② Dipesh Chakrabarty, “The Planet: A Humanist Category,” in *The Climate of History in a Planetary Ag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1, pp. 69 – 70.

③ Dipesh Chakrabarty, “The Planet: A Humanist Category,” pp. 81 – 84.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尤其是世界贫困人们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① 因此，在“可持续性”概念中，地球只是人类活动无声的背景。与之相反，“可居住性”并不以人类为中心，它关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命，亦即地球是如何发展出适合复杂生命存在的环境。人类与“可居住性”的关系因而可以理解为：人类不是可居住性问题的核心，但可居住性却是人类存在的核心。此外，从时间架构上看，“可持续性”涉及的是人类时间（human scales of time），而“可居住性”涉及的是地质时间（geological scales of time）。以生命所赖以生存的氧气为例，一个氧气分子在大气中停留400万年才会被地壳吸收。尽管这一时间已经十分漫长，但是与呼吸氧气的动物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5.5亿年左右的时间相比，则要短得多。

星球史概念的引入，必然会引发对于文明概念的全新思考。传统对于文明的理解，显然是从人的维度出发，将文明视为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因而，“文明”的主要内涵是指人类把自己提升到动物生存状态之上的那些生活特征，包括人类在控制自然、获取资源以满足自身需求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和能力，以及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财富分配的规章制度等。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人类的自我教化，是人类行为向着善良、优雅、理性和秩序的发展，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建立起的社会制度。② 但是，在星球史的框架中，文明的核心不再是人类技术与精神的进步，而是如何确保地球的可居住性进而为生活在这颗星球上的所有生命提供一个可持续性的未来。因此，一个正在出现的星球文明（planetary civilization）将促使人类摒弃以消费、发展和国家间竞争为目的的文明模式，转向一种以气候、环境和生态为重的“后人类”文明模式。

推动这一文明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类超出其他物种的对自然和地球环境的深度参与，正在给地球以及人类自身带来深重的危机。自工

①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② 关于文明的定义，参见何平《文明的观念与教化》，何平、张旭鹏：《文化研究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页；刘文明：《19世纪中叶前中国与欧洲的“文明”观念》，《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业化时代以来，人类对于煤和石油等高碳能源的消耗，以及大量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对生命赖以存在的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这在以下两方面表现得最为严重。第一，碳循环的波动和气温变化。工业化时代以来，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比工业化时代以前高出三分之一，是近1000万年以来的最高值。二氧化碳的排放导致气温，特别是最近20年的气温加速上升，已达到6000万年以来的最高温度。第二，生物的变化。人类的扩张、对环境的破坏和对动物的无节制捕杀，是很多生物灭绝的直接原因。自工业革命以来，生物生活的环境面积缩小了90%，物种减少了一半。人类导致的生物种群的变化速度堪与冰河期来临时相提并论。① 人类对地球地貌和地层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影响，甚至让地球被动地进入"人类世"这样一个新的地质时代。

由于人类力量的参与，星球史时代的文明危机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生命多样性的消失。第二，因气候变化导致的全球变暖。第三，地球可居住性的恶化。仅就当前及可以预见的未来发展来看，这三种危机并没有减缓的迹象，而且极有可能是不可逆的。这说明，地球——或者詹姆斯·拉伍洛克所谓的作为活的有机体的盖娅——正在失去自我调节的能力。② 其结果，很有可能导致地球稳定且充满多样性的生命系统的崩溃，给包括人类文明在内的星球文明带来灭顶之灾，并使地球退回到与其他星球无异的蛮荒状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星球史时代的文明危机呢？保罗·拉斯金曾指出了星球文明的三个特征：生命质量（quality of life）、人类团结（human solidarity）和生态恢复力（ecological resilience）。③ 这三个特征，为我们思考应对之道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生命质量是指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应当获得安全、健康和持续的发展。从空间上看，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生活在一个封闭且能自我调节的生物圈（biosphere）内，其范围大约为海平面上下垂直约10公里，包括岩石圈、水圈和空气。对陆地生命来说，它们共同生活于其中的空间更加狭小，仅仅是地球表面一层薄薄的"关键带"（critical zone），其

① 张旭鹏：《"人类世"与后人类的历史观》，《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② James Lovelock, *Gaia: 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③ Paul Raskin, *Journey to Earthland: The Great Transition to Planetary Civilization*, Cambridge, Mass.: Tellus Institute, 2016, p. 67.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范围自树冠开始一直延伸至地下水的底部。不论是生物圈还是关键带，都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相互依存，并且与地质和自然环境——岩石、土壤、水、空气发生互动，让生命的过程不断延续下去的重要场所。生物圈和关键带的存在，体现了生命、环境与地球之间高度的共生关系，尤其是关键带——这一被布鲁诺·拉图尔称为“地球皮肤”① 的地带，更能展现生命赖以存在的环境的重要性和脆弱性。协调生命、环境、地球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保障生命质量，进而延续星球文明的根本和关键。

人类团结指的是，在当前星球史的大背景下，人类应当摆脱地域和文化的束缚，尤其要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共同去面对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的星球文明的危机。事实上，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部落、种族、阶级、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就始终与之相伴，战争甚至成为人类文明内在的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人类这一正在迈向“后人类”状况的智慧生命依然无法解决在人类诞生之初处就已存在的战争，不得不说这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荒谬的悖论。但不论如何，人类应该意识到，在星球史时代，能够将人类凝聚在一起的，不是作为一种特权单位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人类共同命运的地球家园。② 同时，人类也应该意识到，只有从作为一种生命形式的深度来反思自身，人类才能获得作为一个统一体的存在论基础。正如芭芭拉·沃德和勒内·杜博斯指出的：“在人类的任何一个历程中，我们都属于一个单一的体系，这个体系靠单一的能量提供生命的活力。这个体系在各种变化的形式中表现出根本的统一性，人类的生存有赖于整个体系的平衡和健全。这种统一性并不仅仅是一个幻想，而是客观存在的和无法逃避的科学事实。如果统一性的观点能够变成地球上全体居民的共同见解，我们就可以摆脱一切难免的多中心论，而以必要的统一性为目标来建设人类世界。”③

---

① Bruno Latour, “Bruno Latour on Critical Zones”, https://zkm.de/en/zkm.de/en/ausstellung/2020/05/critical-zones/bruno-latour-on-critical-zones, 2023 年 4 月 12 日访问。

② Mary Evelyn Tucker, “The Evolutionary Context of an Emerging Planetary Civilization”, *Kosmos: An Integral Approach to Global Awakening*, Vol. 5, Issue 2 (Fall/Winter 2005), http://www.kosmosjournal.org/article/the-evolutionary-context-of-an-emerging-planetary-civilization, 2023 年 4 月 3 日访问。

③ ［美］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国外公害丛书》编委会译校，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58 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生态恢复力是指生态系统在受到外界干扰，偏离平衡状态后所表现出的自我维持、自我调节及抵抗外界各种压力和扰动的能力。[①] 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影响，全球生态系统发生了巨大变化，自然生态系统面积不断缩减、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生态系统生产力显著下降等导致了区域乃至全球生态系统恢复力的不断下降。尽管科技进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态系统的功能，但不能替代遵循生态系统恢复力的变化规律。从物质系统演化的角度来看，严格意义上的生态系统的状态转化是不可逆的，即使是恢复力很强的生态系统在受到外界干扰后也会发生改变，无法完全恢复到受干扰前的状态。但是，在实践的层面，人类还是有可能从三个方面去保护生态系统的恢复力。一是维护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能够把生态系统的变化控制到最低，让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有更强的抵抗力和弹性。二是控制气候变化。当气候变化超出生物所能够承受的范围时，便会导致生态系统发生剧烈变化，从而影响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三是限制人类活动。事实证明，人类的活动是生态系统恢复力下降乃至丧失的最重要原因，甚至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气温的升高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因而，保护生态恢复力的关键就在于限制人类的活动。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上述应对星球史时代文明危机的主张基本上是一种建立在理想主义之上的构想。在人类社会中的生存、平等、正义等问题彻底解决之前，诸如人类的团结、限制人类的活动等理想可能仍然是空中楼阁。这也说明，人类文明与星球文明之间存在着很难调和的矛盾。人类文明可以看作人类不断追求上升、自由、安全和舒适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会不可避免地危及星球文明。今天，地球这颗小小的星球似乎已经无法为人类的发展再作出承诺，解决星球时代的文明危机很可能只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然而，就像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变革发生之前，都会被认为是不可能一样，我们还是应当对克服星球史时代的文明危机抱有期待。

埃德加·莫兰在20世纪末展望新千年的未来时，曾说过一段悲观但又不失希望的话，对于我们今天去理解星球时代的文明前景依然有着激励的

① C. S. Holling,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Vol. 4, 1973, pp. 1 – 23.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价值："走出全球铁器时期，挽救整个人类，共同驾驭生物圈，促进地球文明化，这四个主题之间具有循环性的联系，任何一个都是其它三个的前提。全球的垂危将孕育出新的生命：我们将从现在的人类过渡到真正的人类。政治方面新的建树行动应以地球人类作为目标和对象。为抗拒人类死亡所进行的斗争和为促进人类新生所进行的斗争是同一种斗争。"①

（作者张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① ［法］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地球 祖国》，马胜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9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